

文学评论家丛书

感悟与沉思

朱 寨 著

WEN XUE PING
JIA CONG SHU
东荒煤、冯牧主编

人民文学出版社

1206.7/299

文学评论家丛书

感悟与沉思

——一个当代文学研究者的手记

陈荒煤、冯牧主编

朱 寨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九五年·北京

①

1512782

京)新登字002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感悟与沉思/朱寨著.-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5.7

(文学评论家丛书)

ISBN 7-02-002054-2

I. 感… I. 朱… II. ①文学理论-文集②文学
评论-文集 IV. I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4)第13290号

责任编辑:白崇义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100705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北京市人民文学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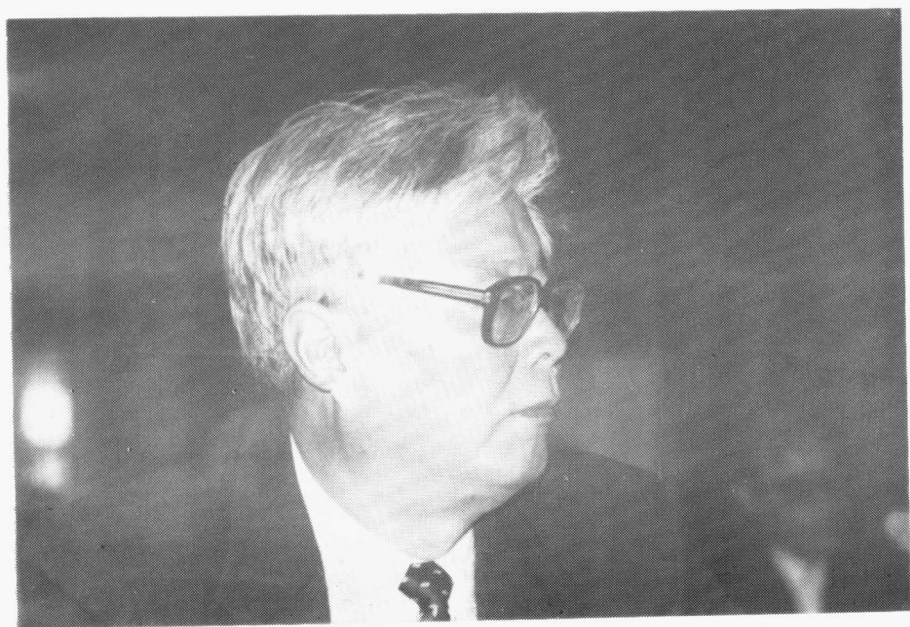
字数109,000 开本850×1168毫米1/32 印张4.75 插页3

1995年7月北京第1版

1995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3,000

定价 7.85 元



作者像

ST-06-104

《文学评论家丛书》总序

陈荒煤 冯 牧

收在这部丛书里的，是活跃在新时期文坛上一些中、老年文学评论工作者的论文结集。他们为新时期文学事业的发展和繁荣付出了自己一份心血与努力，如今得以丛书的形式出版，这在当前商品大潮冲击下，出版严肃书籍相当困难的今天，实属不易。为此，我们感到分外的欣慰。

凡是稍稍对多年来文学发展的风雨历程有过历史的了解和怀任何偏见的人，都会承认，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新时期的文学事业，无论从哪方面讲，都是当代文学史上最好的时期之一。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党总结了深重曲折的历史教训，以拨乱反正的巨大魄力，实事求是，解放思想，果断地调整了一系列文艺方针与政策，认真切实地贯彻了“二为”与“双百”方针，使一度万马齐喑、百卉凋零的文艺局面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文学事业与其他事业一样，得到了复苏的生气与巨大的活力。“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或许可以说，正是在这种新形势下，文学的许多领域，出现了方兴未艾、令人欣喜的复兴。

文学创作开始以严肃、真诚和力求深刻的态度，重新真实地切入和审视历史与社会的深层次变化，并以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和反思精神，深入而广泛地反映了历史与现实惊涛骇浪般的波澜、错综复杂的尖锐冲突，以及由于激荡的社会变动而形成的种种悲喜忧欢的人世沧桑。许多作者以自己切身的感受为经，以

凝重深刻的思考为纬,或深沉,或生动,或庄严,或幽默,或颂扬,或鞭挞,把生活在不同层次中的不同人物的复杂生存状态与隐秘心理活动,用多彩多姿的笔墨,历历如绘、不加讳饰、画卷般地呈现于读者眼前,撼人心魄,扣人心弦。作者对自己笔下人物的美丑心灵与悲喜命运的揭示,获得了脍炙人口、传诵一时的社会效应。

人们把新时期文学这样萌动勃发的格局与气象,称之为文学的“喷涌现象”和“轰动效应”,应该说不失为一种颇具代表性和说明性的概括。新时期的文学事业对彻底否定“文革”,促进改革开放,的确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在回顾新时期以来日益兴旺的文学现象时,我们不应该忘记的是,在促成新时期文学发展的过程中,理论批评工作者曾做过正本清源、总结教训、冲破禁区、开拓新途的大量艰苦工作。如所周知,长期以来,我们在文艺工作的指导思想上,曾有过相当严重的“左”的失误。诸如脱离实际地强调“文艺为政治服务”、“文艺工具论”、“阶级斗争晴雨表”等等提法,以及由此而派生出来的脱离文学艺术自身规律的庸俗社会学、形而上学、“无冲突论”等等清规戒律,与种种似是而非的理论,都曾弥漫于一时。正常的理论批评探讨,被动辄扣帽子、打棍子、抓辫子、上纲上线、横加指责所取代。甚至对日常生活与婚姻爱情的描写,也被极其简单化地加以指责,轻则斥为“情调不健康”、“散布人性论”,重则批为“立场问题”、“政治问题”。这类不问青红皂白、专横武断的“批判”与“罪名”所造成的后果,是十分严重的。许多作者不仅惶恐不安,无所措手足,甚至束手搁笔。到“四人帮”横行时期,文艺事业更遭到了摧毁性的打击,文艺工作者几乎在劫难逃,极少幸免。“四人帮”倒行逆施的极左方针与封建法西斯式的文化箝制,发展到登峰造极的程度,搞出了一整套貌似极

左,实则是破坏文艺规律的条条框框,力图迫使文艺为他们的阴谋政治服务,终于使整个文艺事业濒于绝境,大批文艺工作者所遭到的种种迫害与苦难,更是罄竹难书,一言难尽。

粉碎“四人帮”之后,历史发展出现了巨大转机。特别是第四次文代会上邓小平代表党中央的祝词高度评价文艺工作者对“四人帮”的抵制和斗争,对今后文艺工作提出了很高的期望和要求。于是“雷霆发于孟春,而百卉为之萌动”,文学开始了新的复苏。然而由于“左”的思潮的长期影响,虽然整个局面出现了根本性变化,文学上许许多多清规戒律与大小禁区,却依然沉重地压在文学工作者心头,令人心有余悸。这就严重地束缚了文艺生产力的解放与发展,阻遏了文艺事业的活力与生机。在这样的时刻,如何从理论批评的角度,正本清源,廓清种种严重违背文艺规律的极左思潮,冲破重重人为制造的大小禁区,就成为推动文学发展不可缺少、势在必行的重大步骤。收集在这套丛书里的评论,正是一些评论家们以自己坚持不懈的努力,在这个时期从文学思潮、文学理论与创作评析等等方面,从各自不同的角度进行思考和探讨所取得的成果。他们力求把长期颠倒了的是非黑白重新颠倒过来,还文学艺术规律以本来的面目,他们以高度的热情关注着新时期文学的不断发展,并为文学继续开拓新途,发挥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这些理论批评工作,大体上可以分为如下几个方面:一、力求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文艺观和毛泽东文艺思想对多年来的历史经验教训,进行多方面的剖析与总结,澄清并理顺被极左思潮所搞乱了的理论观点。二、以严肃认真的理论勇气,冲破在“左”的思潮支配下,以庸俗社会学、形而上学为僵死框架制造的种种文学禁区,使作家继续从令人窒息的禁锢与压力下解放出来。与此同时,对于自改革开放时期以来,特别是近年来,随着“大众

消费文化”的泛滥而出现的不利于社会主义与改革开放事业的错误思潮和腐朽思想,进行必要的批评与廓清。三、热情地支持并肯定勇于直面人生,真实揭示社会矛盾,大胆追求真理的新创作、新思想。四、综合观察、追踪新时期文学思潮的嬗变演进,探讨不同阶段创作的利弊得失,以阐述新时期文学的新趋向。五、积极扶植、鼓励脱颖而出的文坛新秀,以及富有艺术品格、艺术个性的新探索,积极支持文学事业持续开展的新机遇。

以上粗略的勾画,是这套评论丛书几个主要的方面,但是由此也大体上可以看出,新时期以来,正是在弃旧图新的历程中,以具有时代新意的创作与理论,构成了两只互为辅佐依傍的有力车轮,不断推动了新时期文学的昌盛和发展。

这些评论家活跃于文坛多年,年龄都已在中年以上,他们的理论特色和他们所经历过的时代风浪与自身的忧患意识紧密相关。因此在他们文论的字里行间,处处流露着为人生、为社会、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强烈入世精神,他们的文字,或许可以称之为文艺社会学批评。即侧重于历史的、社会的、美学的论述与评点。他们在探究文学现象的来龙去脉时,往往也采取这样的视角来加以把握,这无疑有它的长处,但也难免有它的局限,比如对于作品的艺术情趣与艺术个性的分析与品味往往不免流于粗疏。另一方面,对文学理论和创作中热衷于搬用西方某些观点与模式的现象,也还缺乏深入、具体的剖析。出版这套丛书,并无意于褒贬某种“模式”或“流派”,更非以求定于一尊。正如文学现象本身和社会生活一样丰富、生动、复杂,文学的理论与批评,不能也不应以单调划一的角度去把握多样的文学形态,而是理所当然地应以多种审美方式与审美角度,从不同层次去研究、探索、理解、评析各种丰富、生动、复杂的文学现象,以期更贴切、更准确、更深入地把握奔流万汇的文学大河,从而求得

某种参透与领悟。不同的理论批评正是以自己具有的特点与长处,而取得各自存在的根据与理由。在学术思想的发展过程中,互相地吸取、融汇与渗透或许更重于互相拒绝、排斥与否定。建立与维护正常的争鸣与辩诘的良好氛围,更无疑是学术发展的必要前提。因此,我们以为这套丛书的出版,无论就历史意义还是就现实意义而言,都有它的价值。至于文学本身,或高华,或沉实,所谓“有色有声、有气有骨、有味有态,浓淡深浅,奇正开阖,各极其则。”文学理论亦复如此,也只能各抒己见,力求在平等的探讨中求得共识,却不可囿于固有的偏见或成见,恣意武断地判定是非曲直。

当前,全国都在热情地学习《邓小平文选》,力求更深刻地理解小平同志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对于文艺理论工作者来说,更有责任进一步认识和贯彻小平同志对文艺工作提出的一些基本要求,更全面、更深入地贯彻“二为”和“双百”方针,共同为提高我们民族的思想文化素质,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作出应有的贡献。

这套丛书,格于经济方面的诸多困难,未能编入近年来卓有成绩的青年文学评论工作者的文集,使我们深以为憾,这只有俟诸他日,再求弥补了。

目 次

社会主义时期的文学理论批评	1
“十七年”中篇小说巡礼	12
向生活和艺术的多层面掘进	33
“新时期文学”七题	43
“中国新时期文学十年学术讨论会”描述	43
从文学的解放到文学的自觉	46
评论更需要自由	48
文学应举起本国旗帜	50
“现代”、“当代”的概念越来越显得不准确	51
胡风文艺思想的几个要点	52
说一说葛洛	53
俞平伯《红楼梦》研究“自传说”辨正	57
关于“报告小说”的求教	60
“起码读三遍”	63
表演的是艺术而不是技术	66
一个当代文学研究者的感言	69
心灵的烛照	72
理性的审视	75
《审美的沉思》序	79

伴随着时代的行吟	81
——作家荒煤	
韦君宜和她的《母与子》	103
《绿化树》预示着什么?	110
读《轮椅上的梦》	115
评《白鹿原》	120
诗的散文美	127
——读《大海的心》致方冰同志	
平和、清丽与家常	131
——读简宛的《合欢》、《欧游心影》	

附录

在文学的道路上仿佛还没有开始	135
后记	142

社会主义时期的文学理论批评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诞生,“中国的历史,从此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毛泽东),中国的文学艺术随之进入新的阶段,文学理论批评工作也具有了新的历史内容和特点,在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转变的历史背景和要求下,全国范围内贯彻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提出的文艺新方向;文艺工作不仅在思想原则上,而且在组织领导上,都是在党和政府的直接领导之下,与政治生活的关系更加密切。建国后,虽然有时在指导思想上也曾犯过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又经历了“文化大革命”,但还是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文艺工作,包括理论批评,也走过了同样曲折的历史道路,其成就也同样是主要的。

首先应该提到的是毛泽东文艺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又有新的发展。建国初期,1951年讨论电影《武训传》时,毛泽东在《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中提出了文艺创作应当歌颂什么和不应当歌颂什么的问题,批评“我们的作者们也不去研究自从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以来的一百多年中,中国发生了一些什么向着旧的社会经济形态及其上层建筑(政治、文化等等)作斗争的新的社会经济形态,新的阶级力量,新的人物和新的思想。而去决定什么东西是应当称赞或歌颂,什么东西是不应当称赞或歌颂的,什么东西是应当反对的”。这对于刚刚进入新中国的

文艺工作者,具有理论指导意义。1956年,随着对生产资料所有制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国内主要矛盾有了根本变化,人民内部矛盾成为社会的主要和普遍的矛盾。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毛泽东提出了关于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问题,并在这样的理论基础上,提出了关于繁荣社会主义文艺、发展社会主义科学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这是毛泽东文艺思想进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历史阶段的新发展。事实证明,这确实是符合科学艺术客观规律的方针。而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理论的确立,在文艺创作和理论上向人们相应地提出了如何反映人民内部矛盾的新问题。像某些传统的艺术形式和手法,如悲剧、喜剧、讽刺如何运用于人民内部矛盾题材,在理论批评界展开过广泛的讨论。

六十年代初,中共中央总结了“大跃进”的失误,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周恩来、陈毅分别就文艺问题发表了重要的讲话,如周恩来的《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1961年6月19日)和《对在京的话剧、歌剧、儿童剧作家的讲话》(1962年2月17日);陈毅的《在戏曲编导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1961年3月22日)和《在全国话剧、歌剧、儿童剧创作座谈会上的讲话》(1962年3月6日)。这些讲话,不仅纠正了“大跃进”以来文艺指导思想上的极左偏向,强调尊重艺术规律、发扬艺术民主,具有指导原则的意义,而且对一系列基本理论问题,如文艺如何为政治服务、如何反映社会主义时期人民内部矛盾,新英雄人物的创造、典型、时代性和时代精神,阶级性与人性、思想性与艺术性等问题都作了理论上的阐明论证。因此,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后,这些讲话公开发表或重新发表,成为文学理论批评上拨乱反正的指导性文件。

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早从二十、三十年代起,一直是革

命文艺运动的一个中心问题。建国以后,又自觉或不自觉地将
为政治服务具体化为就是为政策服务,把这作为体现新文艺方
向的总口号,由此产生了一系列消极后果。粉碎江青反革命集
团以后,文艺理论批评上的重大突破,首先就是文艺与政治的关
系。邓小平《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词》
(1979年10月30日)中说:“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不是发号施
令,不是要求文学艺术从属于临时的、具体的、直接的政治任
务”;“写什么和怎样写,只能由文艺家在艺术实践中去探索和逐
步求得解决。在这方面,不要横加干涉”。随后又在《目前的形
势和任务》(1980年1月16日)中说“不继续提文艺从属于政治
这样的口号,因为这个口号容易成为对文艺横加干涉的理论根
据,长期的实践证明它对文艺的发展利少害多。但是,这当然不
是说文艺可以脱离政治。文艺是不可能脱离政治的”。胡乔木
在《当前思想战线的若干问题》(1981年8月8日)中,对此也作
了详细的阐释,并从根本上说明“我们的一切政治归根结底都
是为大多数人谋利益的手段,政治本身并不是目的”,“我们不
能为政治而政治,所以也不能为政治而文艺等等”。关于文艺批
评标准问题,胡耀邦《在剧本创作座谈会上的讲话》(1980年2
月12—13日)中,明确提出“我不大赞成机械地把某个标准排
在第一,某个标准摆在第二。我认为真正的艺术品应该是政治和
艺术的高度统一,或者说,应该使思想性和艺术性浑然一体。好
的文艺批评,必须从两者的统一上来对作品进行深入的、细致
的分析”。胡乔木在上述剧本创作座谈会上就这个问题也作了
发挥。首先指出,“把文艺作品的思想内容简单地归结为作品
的政治观点、政治倾向性”是不确切的,“文艺作品的思想内容
涉及的方面很多,包括政治观点、社会观点、哲学观点、历史
观点、道德观点、艺术观点等等,而且这些观点在文艺作品
中都不是抽象的,而是

同艺术的形象、题材、构思，艺术所反映的生活真实相结合的”，“不能孤立地把政治标准作为衡量文艺作品的第一标准”。这个问题的正确解决，为克服革命文艺创作中的“标语口号化”痼疾，使文艺批评成为审美活动，起了关键作用。

建国以后的文学理论批评，始终与政治运动联系着，一些文艺问题往往成为政治运动的导火线，属于文艺本身的问题，因此不能正常展开和深入探讨。在批判电影《武训传》、《红楼梦研究》及胡适文学观、胡风文艺思想等运动中，发表了大量批判文章，出版了几套文辑，除少数文章具有相当理论学术的深度以外，大多数文章过后来来看只有历史资料的意义。不过，它们涉及到许多文学理论批评中的重要问题，如在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中，建国以来文艺思想理论上的重要问题几乎都有集中的反映。只是由于错误的政治前提，致使不少结论流于简单、片面。胡风的政治冤案平反后，这些问题正重新辨析探讨。有的批判开了以政治运动的方式解决思想学术问题的先例，但也提出了重要的理论指导原则，如上述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对《红楼梦》研究方面唯心主义观点的批判，虽然也存在着思想批判运动常有的弊病，如误解或歪曲批判对象的观点，意见一面倒，不能争鸣等。但这次批判的问题，更带有学术性质，由批判导入对于《红楼梦》本身的分析研究，扫除了新旧“红学”在这部伟大作品上制造的种种迷雾，开始把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和现实主义理论批评方法运用于《红楼梦》研究，开始了“红学”的新阶段。李希凡、蓝翎的《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它》和《评〈红楼梦研究〉》两篇文章，被称为“是三十多年来向古典文学研究工作中胡适派的资产阶级立场、观点、方法进行反击的一枪，可贵的第一枪”（钟洛：《应该重视对〈红楼梦研究〉中错误观点的批判》），确实起了发难的作用。后来的蒋和森的《红楼梦论稿》、何其芳的《论〈红

楼梦》),用新的观点对《红楼梦》的人物形象、思想倾向、艺术特点,作了较全面的分析,在读者中有广泛的影响。周汝昌的《红楼梦新证》,王昆仑的一系列《红楼梦》人物论,原是解放前的旧稿,经过修订后重新出版、发表,也有较大的影响。吴世昌、吴恩裕对于《红楼梦》的版本、作者都有不同于人的见解。俞平伯本人后来又写了《〈红楼梦〉中关于“十二钗”的描写》长文,以新的观点对于《红楼梦》的“十二钗”描写重新作了精细的艺术分析。

由于《红楼梦》研究方面的批判和讨论,推动了整个古典文学领域的研究工作。先后围绕着李煜词、《琵琶记》、山水诗、人民性、以及如何批判继承文学遗产等问题,展开了讨论;屈原、李白、杜甫等诗人和一些古典小说戏曲,都有较多的研究。五十年代末期起,还陆续出版了几部影响颇大的文学史著作。北京大学中文系集体编写的四卷本《中国文学史》,对于中国古代文学发展规律作了新的探索,提出了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的观
点,引起古典文学研究界的讨论。后来又有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集体编写的《中国文学史》(3卷本)和游国恩、萧涤非、王起、季镇淮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4卷本),观点较前稳妥,资料也较详实。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曾经是比较冷僻的方面,也开展了广泛的研究,产生了一些重要成果。对于中国古典文艺理论经典著作《文心雕龙》的考察,从过去的以考证、校勘、注释为主进入系统的理论研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受到学术界重视的有杨明照、牟世金等人的著作。王元化的《文心雕龙创作论》,不仅对《文心雕龙》本身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同时以《文心雕龙》的理论体系为径,综观中外有关论著,探讨了文学创作的规律,对于创作的主客观关系、艺术想象、创作个性、表现与概念、思想与感情、艺术结构以及创作过程和创作行为的自觉与不自觉等问题,都作了辨析,堪称具有民族特点的“创作论”。

关于中国文学批评史的著作,除了郭绍虞、罗根泽修改再版的中国批评史旧著,还有黄海章、刘大杰、敏泽各家编写或主编的新著,钱钟书的《管锥编》学术上包罗万象,不限于中国文艺理论批评,但其中包含着大量如他的《谈艺录》那样的精辟内容。对于中国古典文艺理论批评的研究和继承,是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不可缺少的条件。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和当代文学研究,作为独立的学科,都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事。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完成于五十年代初,第一次对刚刚结束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文学历史,作了全面、系统的述评,在学科建设上带有开创意义,并且具有史料丰富、立论较为公允的长处。随后陆续出版的有蔡仪、丁易、刘绶松、张毕来等人的现代文学史著作。五十年代末期,还出现了一批由大学师生集体编写的现代文学史教材。在“左”的思潮的影响下,特别是直接受到一些政治运动和文艺批判运动的冲击,对于现代作家作品的研究,范围越来越狭窄,评价也越来越苛刻。由唐弢、严家炎主编,集体编写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开始写于六十年代初,定稿于七十年代末,注意吸取已有的研究成果,经过多次修改,尽量根据第一手材料,清除“左”的影响,纠正了某些错误的判断,对作家作品的分析评价,比之以前各种更加详实贴切。从七十年代末期起,以大专院校的教师为主力,分别编撰出版了多种现代文学史教材,对于纠正“左”的错误,做了不少工作。现代文学研究方面,对于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赵树理等作家,和“五四”文学革命、三十年代左翼文学、解放区文学等课题,都有较多的探讨;其中以鲁迅研究最为活跃,成就也最大,冯雪峰、李何林、唐弢、王瑶、陈涌等人,都作出了各自的建树。近年来,由于突破了长期“左”的思想束缚,一向被冷遇的现代作家作品,如周作人、沈从文、丁玲的